

悲愤与痛苦：五四妇女解放运动中的情感动员 ——以天津为中心

冯剑侠

摘要：从情感史的研究视野出发，以邓颖超、刘清扬、李峙山等五四时期天津妇女解放运动家为中心，考察她们如何借助妇女报刊展开情感动员，以唤起妇女意识觉醒和公众同情的历史过程，探索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情感逻辑。研究发现，对国家的爱、对丧权辱国的愤怒，和作为“女国民”平等承担国家与社会责任的自豪感，共同型塑她们的主体意识。因妇女普遍而深重的苦难所产生的“悲愤”和“痛苦”之情，是她们投身妇女解放运动的情感驱动力，也是她们通过情感仪式和媒介展演来动员妇女最常用的情感资源，在青年读者中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和圈层共振，建立起妇女解放的团结网络。

关键词：妇女解放；情感动员；情感仪式；媒介展演

中图分类号：D4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9)03-0090-10

DOI:10.16493/j.cnki.42-1627/c.2019.03.009

1919年5月26日，罗家伦用笔名“毅”发表文章，把5月4日发生的事件称为“运动”，是“再造中国的元素”，五四运动由此得名。一年后，他在纪念五四运动的文章中评价：“总之‘五四’以前的中国是气息奄奄的静的中国；‘五四’以后的中国是天机活泼的活的中国。‘五四运动’的功劳就是使中国‘动’！”^[1]

这场使中国“动”起来的五四运动，可被看作是一场“从知识分子到全民动员的社会运动”^[2]、“有着广泛动员和群众基础的集体行动”^{[3](P90-101)}，应从“社会史化”的研究路径给予重新审视^{[4](P3)}，如“运动家”采取怎样的文化传播策略与社会互动，使“新文化”得以“运动”起来^[5]。

值得注意的是，因长期被隔绝在公共生活之外而最缺乏“政治的常识”和“社会的关心”的“沉沉女界”^①，也在五四中“运动”起来了。这显然超乎五四知识精英的心理预期。就在1919年2月出版的《新青年》上，李大钊撰文引介西方的妇女参政权运动时，还在文末表达自己的疑虑：“我们中国的女界，对于这世界的妇人问题，有点兴趣没有，我可不敢武断。但是我很期盼我们中国不要长有这‘半身不遂’的社会。我很盼望不要因为世界上有我们中国，就让这新世纪的世界文明仍然是‘半身不遂’的文明”^[6]。然而，几个月后，以女学生为先锋，包括知识妇女、家庭妇女、城市女工在内的各阶层妇女作为积极的行动者登上政治舞台，在投身爱国运动的同时，展开了一系列争取社交公开、教育平等、经济独立、婚姻自主、参政议政等平等权利的妇女解放运动，一扫李大钊的疑惑，也一改新文化运动初期由少数男性为妇女解放疾声呐喊的寂寞苦辛。

那么这一广泛而成功的妇女动员是如何发生的？这将不可避免要论及妇女运动家采取的传播与

基金项目：西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2017SZYQN37）

作者简介：冯剑侠，新闻学博士，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四川成都610041）

① 参见向警予：《中国妇女宣传运动的新纪元》，载《妇女日报》1924年1月2日。

动员策略。尽管研究五四妇女报刊的创办及其发展、女性主体意识觉醒及言说的文献汗牛充栋，但对于妇女运动中最重要斗争动力和动员资源的“情感”，学界尚未有足够关注。本文以邓颖超、刘清扬、李峙山等五四时期天津妇女解放运动家为中心，考察她们如何借助报刊媒体展开情感动员，以唤起妇女的意识觉醒、争取公众舆论支持的历史过程，探索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情感逻辑。

一、“情感史”视野中的民众动员与妇女解放

不论是在日常生活还是社会运动中，喜怒哀乐、爱憎恨怨等情感都占据核心地位，并构成社会冲突的道德语法。“没有情感的生活，就是没有活力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情感的表达，就没有社会运动。古往今来，不论什么样的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都是带有情感色彩的行动。往往是行动的方式愈激烈，情感色彩越重。”^[7]然而在学术史的脉络中，受柏拉图以来理性与情感二元对立思想影响，对情感的轻视和贬低使其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直到1970年代中期一场“情感研究的革命”影响社会科学众多领域，才出现情感转向（Affective Turn）的新局面^{[8](ix)}。

作为一个新方向，情感史在当代史学研究中方兴未艾。情感史视野对中国革命研究有独到的解释力。情感史关注人的心灵、情绪和时代的精神结构，不仅有助于理解情感本身的“历史性”问题，如悲伤、愤怒、恐惧、狂热、喜悦等各种情感在革命中的表达、革命过程中情感的特殊性、情感和政治的关系等，而且从情感史视角看革命，能为中国革命的研究打开一些新的空间和维度^[9]。尤其受到关注的是情感在民众动员中的突出作用。“情感动员”指的是“个体或群体通过情感表达，在持续地互动中唤起激发或者改变对方个体或群体对事物的认知态度和评价的过程”^[10]。

情感动员是现代民众运动中所普遍采取的方式。裴宜理指出中国共产党高度依赖情感工作，有效的情感动员让人们“衷心地想要投入到一种高度情感化的正义事业中去”，最终战胜国民党并实现革命宏图。情感是重访中国革命的关键性因素^[11]。例如，诉诸情感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改革发动农民诉苦运动中最重要动员机制和技术，有效地激发农民对地主的愤怒和仇恨之情，培养对共产党的感激和爱戴之情^[12]。情感动员并非共产党专属。国民党也运用民族主义的情感动员手段，来扩大社会基础、打击帝国主义、巩固广东革命政权^[13]。

并非只有政党政治才注重情感动员，情感也被西方妇女史研究者视为理解妇女运动的中心因素。有学者发现美国第二次女权运动浪潮中妇女组织“情感文化”的存在：通过示威、游行和各种文化仪式（如音乐、电影、诗歌朗诵、展览、戏剧），愤怒、同情、憎恶、抑郁等情感在妇女抗争中发挥动员作用^{[14](P223-233)}。“愤怒”是西方妇女运动中最重要的情感动员力量。妇女运动家有意识地将痛苦、同情、羞耻和抑郁等破坏性情绪转化为愤怒，来保持对不平等性别权力结构的对抗性力量^[15]。因此，情感不仅是作为动员的手段，也是行动者们自我定义的基础，参与人的主体性建构，鼓舞人们做出勇敢的抗争行为，在“集体认同”中占据重要地位^[16]。

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史的研究中，“情感”的地位及其作用依然是晦暗不明的。尽管有研究从个体妇女的解放实践出发，探讨离家出走寻求解放的女性对于家庭既怨又恋的“怨慕”情结及其由此衍生的情感困境^[17]。但在妇女解放运动的革命史书写范式中，妇女解放的先驱们总是以意志坚定、斗志昂扬的女革命家形象出现，受爱国热情这一单一情感类型的感召，其思想启蒙与意识觉醒过程被看成是投身革命洪流的自然结果，愤怒、伤感、痛苦、同情、抑郁等更丰富的情感类型隐匿不显。在性别史研究范式下，一些研究着重通过妇女解放运动中的媒体言说与社会行动来展现具有社会性别意涵的女性主体经验^{[18](P138-148)}，强调的是女性知识精英的“思想”层面，而忽略了她们的情感结构。

基于以上学术史回顾，本文将五四妇女解放视为一场民众动员的话语实践，在其得以发生、发

展和推进的全过程中，离不开行动主体策略性地借助传播媒介展开情感动员以唤起公众的同情和舆论的支持。本文拟对以下问题进行探讨：五四时期的妇女运动家们带着怎样的情感体验投身妇女解放运动？她们运用了哪些传播策略、以什么样的情感动员机制、唤起了怎样的公众同情与参与？

二、投身妇女解放：联络同志与创办媒体

邓颖超、刘清扬、李峙山等天津妇女解放运动的核心成员是在五四爱国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新女性。她们高喊“惩办卖国贼”、“拒签凡尔赛条约”等口号，冲破阻挠走上街头，或参加集会请愿、游行示威；或公开演讲、走访家庭，向民众传播爱国主义和男女平等的思想。对国家强烈的爱，对丧权辱国的强烈愤慨，以及作为“女国民”平等承担国家和社会责任的自豪感，共同型塑了她们的主体意识。在邓颖超的印象中，这段经历始终充满乐观积极的情感基调：

“男女同学间的相处是极其自然坦白的，工作上相互尊重平等的，大家一心一意忙着救国、忙斗争，在工作上竞赛，女同学不肯后人。女同学中的积极分子明白自己要做开路的人，就不能遗笑社会，挡住了后来人的路，一定要好好干，做出一个榜样来。在当时男同学中的积极分子，受了新思潮洪流的激荡，重男轻女的思想也被大大的打破了，对女同学都很尊重的。在工作上的责任上，都是平等担当。”^{[19](P537)}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她们作为“人”的主体意识苏醒，第一次亲身实践并真切地体会到了作为现代公民的自由、平等与解放。然而，随着慷慨激昂的学生运动在1920年夏渐告平息，她们不得不回归和面对依然禁锢着女性的家庭、社会、职场和教育环境。不论是职业领域的性别歧视，还是婚姻家庭对女性的束缚，都让她们深深体察到作为“人”的主体意识与身为“女性”的性别身份之间的矛盾。

邓颖超和李峙山的感受最为深刻。邓颖超毕业后成为北京高师附属小学首次任用的两名女教师之一。然而，长时间的工作、低廉并常常被拖欠的工资却让她身陷入不敷出的窘境。她为“改图别业”而半工半读，“精神身体日渐损坏”，然而社会能为女性提供的就业机会少之又少^[20]。李峙山婚前是经济独立的小学教师，在结婚尤其是生育之后，因为社会对有孩子的女性普遍存在的偏见让她很难找到工作，只能依赖丈夫为生，让追求独立的她在精神上陷入极度的痛苦^[21]。她们发现，昔日五四运动中活泼聪明、奋力向上的天津女师学生，结婚后从身体到思想都被旧家庭所腐蚀：“她们的太太的臭味，少奶奶的体态，被家庭气病了的憔悴的模样，对待自己婚姻所发的不满意和伤心语，都深深地镌入我的脑里不能忘记”^{[22](P544)}。

在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了社会对于女性的限制后，她们感到“实非鼓动大多数的女子起来打破现有的经济制度与社会组织不可”^{[23](P12)}。她们联合学生运动中结识的男女进步青年，组建妇女团体、兴办妇女报刊、建构女权话语、发起女权运动，将为更多妇女争取平等与解放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如表1所示）。

为了“宣传女子自救自决的思想”^①、为女子解放“做些带刺激性的鼓吹”^②，邓颖超、刘清扬、李峙山等人先后创办了不定期刊物《女权运动同盟会直隶支部特刊》、《女星》旬刊以及每日出版的《妇女日报》。三份妇女报刊均带有妇女替代性媒介（Alternative Media）的特征，即不以盈利为目的、非商业化运作方式，旨在帮助妇女认识到自身的主体价值，传播男女平等的社会意识，为妇女运动者提供行动、计划和网络信息^{[24](P248)}。在经费上，通过向加入女星社的会员收取会费、募捐，

① 参见：《女星社的简章》，载《女星》1923年5月25日。

② 参见：《发刊词》，载《妇女日报》1924年1月1日。

表 1 天津妇女解放运动中的行动网络^①

团体名称	活动时间	行动诉求	发起人	参与者	主要行动	创办媒体
女权运动同盟会直隶支部	1922年10月28日成立；1925年随主要成员离津停止活动。	扩张女子在法律上之权利及地位。	邓颖超、王贞儒、冯梅先、曹世安、鲁自然、张冠时、陈英才、张冰贞	达仁女校、第一女师、严氏女中、中等女校教师与学生四百余人。	向国会请愿争取女权，开展女子教育，反对包办婚姻等。	随《新民意报》发行《女权运动同盟会直隶支部特刊》
女权请愿团（由学生同志会女权股发起）	1922年11月5日成立；1924年以后随主要成员离津停止活动。	赴国会请愿女子参政权，以谋男女平等。	黄勳志、华志清、邓颖超	成立时三十多人，多数是基督徒。	向国会请愿争取男女平权，争取女子教育权，废娼运动，反对包办婚姻。	无
女星社	1923年4月2日成立；1925年春因主要成员相继南下参加国民革命渐解散。	实地拯救被压迫妇女；宣传妇女应有的觉悟；力求觉悟女子加入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邓颖超、李峙山、刘清扬、王贞儒、冯悟我、王南羲、胡倾白、谌小岑（男）、赵景深（男）、顾骏霄（男）	天津本地文化教育界职员二十余人；本地及外地社友二十余人。	宣传妇女解放思想；为失学妇女开办补习学校；促进女子平民教育；反对包办婚姻、倡导婚恋自由。	随《新民意报》发行《女星》旬刊；出版《妇女日报》。

或通过演剧等方式募集出版所需资金。邓颖超、李峙山、刘清扬、谌小岑等人既是编辑又是作者，都是无酬劳动；在内容上，举凡国内外妇女运动的现状报告，与妇女问题有关的讲演、讨论、批评、专件、通信，关于妇女教育、职业、生活、婚姻的实地调查，以及宣传妇女解放的文艺作品均予以刊载。

为了扩大妇女动员的影响面，邓颖超等人高度重视与读者的互动来构筑编读之间的交往网络。如《女星》常常以“女星的话”、“本刊第XX期的话”、“本刊的第X期”等标题公开回应读者的建议；《妇女日报》在第四版开设“自由论坛”供读者发表对于妇女运动的意见等。另一方面，她们善于搭建多层次报刊媒体的传播矩阵，充分借助同情和支持妇女解放运动的男性知识分子所创办的主流媒体——如天津《大公报》、《益世报》、《新民意报》——来拓宽自己的发声渠道。同时，她们还加强与妇女运动同人报刊的联动，积极地联络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妇女运动者，让《女星》和《妇女日报》成为妇女运动相互呼应、彼此支持的言论平台。如《女星》创刊后，除了随《新民意报》本地发行，还加印一千份，分寄给全国关心妇女运动的团体、报刊和朋友，和上海《民国日报》的《妇女评论》、杭州的《妇女旬刊》、广州的《新妇女》、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的《女权特刊》等二十家报刊建立了交换关系^②。

借助报刊等现代传播媒介的策略性使用，妇女运动家们开展了积极的妇女动员。下文以报刊文章、读者投书、当事人的回忆及传记为史料来源，考察天津妇女解放中最为强烈的两种情感——悲愤与痛苦——如何被运用。

三、“悲愤”的动员：作为情感仪式的张嗣婧追悼会

张嗣婧之死是一个典型的创伤性事件，使天津妇女解放运动的情感氛围从乐观积极转向悲愤交

^① 资料来源：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和天津市妇女联合会共同编辑的《邓颖超与天津早期妇女运动》（1987）、《天津女星社》（1985），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上、下，1979），《五四运动回忆录》（2013）。

^② 参见：《已与本刊交换的各种刊物》，载《女星》1923年6月5日。

加。张嗣婧是邓颖超在直隶第一女子师范的同班同学,在五四爱国学生运动的历次游行、示威、演讲中极为活跃,是天津学生运动核心组织“觉悟社”的成员(代号37,化名衫弃)^①,也是女权运动同盟会直隶支部的会员、一个经济独立的职业女性。然而,“并非一个时代的落伍者”的“新女性”,却在短短两年多的包办婚姻中受尽婆家虐待与折磨,1923年3月24日因产后失调在痛苦中去世,年仅21岁。“同人等闻此噩耗,莫不悼惜!”邓颖超等女权运动同盟会直隶支部同人一致决定召开追悼会,通过纪念张嗣婧来探讨妇女解放面临的问题。从登报向各界征求挽联与挽词,到追悼会的召开,以及通过媒体具细无遗的报道,一场旨在“化悲愤为力量”的情感仪式正式展开。

仪式是社会运动中集体行动者表达情感的文化机制。人们聚集在同一场所,将注意力集中在共同的对象或活动上,分享共同的情绪或情感体验。在这仪式性的互动中,情感得到了增强或转化,个体情感变成集体情感,成为涂尔干所谓“集体兴奋”,“而后它们产生了作为结果的其他类型的情感(特别是道德团结,有时是诸如愤怒这类攻击性的情感)”^{[25](P157)}。追悼会是五四时期新文化倡导者们“借个题目向旧家庭社会作一种示威运动”的常见仪式。典型者如1919年11月30日由蔡元培、胡适、李大钊、罗家伦等人为李超所举行追悼会,旨在“用社会考察的方法将女性问题化”,是新文化运动中重要的公共事件^{[26](P58-111)}。

与偏理性的、侧重讨论问题的李超追悼会有所不同,张嗣婧追悼会是一场哀伤、痛苦和愤怒贯穿始终的情感仪式。这首先体现在追悼会的地址选择和场景布局上。会场设在张嗣婧的母校第一女子师范的礼堂——这是她生前多次参加学生集会的地方。会场做了简单的布置,烘托出哀伤而肃穆的情感氛围:讲台上放着几盆花,讲台壁的正中央挂着张嗣婧一个半身相,两旁伴着女权运动同盟会的挽联:“嗣婧竟消极牺牲,致念一载光阴,徒供哭泣;我侪誓努力奋斗,使两万万姊妹,得庆重生”;讲台上挂着觉悟社的横匾,写着“参加今天追悼会者,应该有些新觉悟!”两旁墙壁上都满挂着挽联^②。

挽联中的挽词无不体现出对张嗣婧被旧制度凌虐的痛心、愤怒,以及召唤妇女觉醒和反抗的迫切心情。如天津女星社的挽联悲哀叹惋:“叹牺牲在旧婚制下者,比比皆是;惜奋斗于恶社会中的,寥寥数人。”觉悟社的挽联直指问题:“家庭制度不推翻,妇女焉能解放?社会阶级需打破,我等才得自由。”^③追悼会全程笼罩在悲愤交加的情感氛围中。主席王贞儒致简短的开会词后,全体参会者唱起了追悼歌,“歌词凄惨而愤慨”:

“旧礼教旧家庭害杀不少姊妹们,哀我同志嗣婧竟被摧残,含恨以牺牲,愤极痛呼!

姊妹们努力速往前进!勿畏缩!勿因循!奋斗牺牲!勿再如嗣婧!”^{[27](P265)}

邓颖超报告张嗣婧的生平及致死过程,倾注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强烈情感。在邓颖超的叙述中,张嗣婧虽然有着参与爱国运动的热情与勇敢,但受限于“温柔谨厚能忍的个性”和“预备做贤妇”的家庭教育,虽然对包办婚姻万分不满,“几欲自杀”,又由于母女情深,担心退婚使病中的母亲“伤心为难,有违孝道”,不得不“饮恨就嫁”。婚后受到婆婆、丈夫和大小姑的虐待羞辱,“诚实可欺”的她不敢得罪,极力隐忍,直到产后失调、忧劳过度病重,却被婆家拒绝医治,

^① 天津觉悟社是五四爱国学生运动中,应男女青年合作工作和互助学习的要求而组织起来的。1919年9月16日经周恩来倡导,20名天津学生运动中的男女骨干在天津草厂庵学生联合会办公室举行觉悟社成立大会。觉悟社社员姓名不对外公开,用抽签的方法在50个号码中取名作为通信的代号或发表文章的笔名。刘清扬:《有关天津五四运动和觉悟社的一些情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总第103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② 参见:《追悼会的一个缩影》,载《女星》1923年6月5日。

^③ 参见:《挽词(录要)》,载《女星》1923年6月6日。

含恨而死^①。邓颖超报告到张嗣婧死前惨状，痛心疾首，声泪俱下，来宾跟着落泪^②。

追悼会在激发参与者对张嗣婧不幸命运的“同情”基础上，更指向情感的认知维度，进一步分析和研究造成张嗣婧之死的深层原因。李峙山、王南羲、李廉祺等其余女权同盟会的会员和来宾先后发表演说，剖析旧式婚姻制度、教育制度、封建礼教如何导致张嗣婧的不幸命运，反思女性面对不幸时的意志薄弱，呼吁女性的反抗和团结。追悼会结束后，女权运动同盟会将这场情感仪式的详细经过刊载在《女星》和《女权运动同盟会直隶支部特刊》上，超越时空发挥其影响力。

四、“痛苦”的动员：妇女集体性苦难的媒介展演

如果说张嗣婧之死激发的是妇女运动家们悲愤交加的“状态情感”（Acute Affective Phenomena），是因事件发生而产生的阶段性应急反应。那么，贯穿于整个天津妇女解放运动中的长期性“基调情感”（Background Affective Phenomena）则是因妇女的普遍而深重的苦难而感受到的“痛苦”^[28]。这在运动家们创办的《女星》旬刊和《妇女日报》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痛苦”不仅是她们展开行动的情感驱动力，也是为妇女解放做些“刺激性的鼓吹”时最有力的情感资源。

在《女星》旬刊的发刊词中，女星社成员表达了对“女子所受的痛苦还倍于劳动者”的同情，“因时时感受了这种种的痛苦，受良心的驱使，久想有所作为”^③。于是创办报刊，作为“妇女诉苦的机关”，不仅向读者“多征集关于女子处在现地位及婚姻问题所受痛苦的实事报告”^④，还从报刊上搜集各界妇女痛苦的事实予以报道。《女星》的“时事杂感”栏登载了妇女受害的具体事例。如第二期的《一个自蹈水火的女子》、第五期的《一个罪恶婚姻底成功和忏悔》、第六期的《杜月芬之死》、第八期的《旧礼教演成的悲剧》等。邓颖超写了《受了婆婆教训的一个同学》（第十期）、《经济压迫下的少女》（第十五期），讲述身边同学的痛苦。

逐日出版的《妇女日报》版面更为丰富，设有“中国女子地位写真”、“各地琐事”、“妇女劳动界”等专栏，报道女性受欺压、凌辱的事例更多，也更加触目惊心。仅1924年2月的21天中，经《妇女日报》披露的“多妻惨剧15起，杀妻4起，打妻及虐媳9起，牺牲于不自由婚姻的8起，离婚4起，贩卖女子9起，卖女5起，牺牲于早婚的2起，卖妻的1起，奸淫的5起”^⑤，合计共62起，平均每天3起；3月，除了上海某纱厂被烧死女工六十多人、烧伤多人及保定女二师学生被校方毒打这两件“整体欺压、践踏女子的惨剧”外，还有被丈夫虐待的19起，被婆婆虐待的25起，牺牲于各种恶制度下的总共80多起^⑥。为搜集这些新闻，女星社订阅了二十几份外地的报纸，也时常转载天津本地报纸中关于妇女的悲剧新闻，诸如“旧礼教又逼死了一个”、“服毒身死两女子”、“一个女学生的惨死”、“一女竟卖两家”、“婚期寻短见”、“逼妻为娼”、“逃跑一个儿媳、打死一个女儿”、“童养媳被虐潜逃”等，日必数则^[29]。

“痛苦”不单是个体的一种情感或生理感受，常常是社会结构的产物^[30]。人们对痛苦的认知和评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痛苦的归因，这反映了人们对痛苦来源的不同理解。在传统的乡土社区，“妇女讲述的苦似乎更无从归因，因为她们是女人、是媳妇，或者缠了小脚，她们的苦似乎就成为

① 参见颖超：《张嗣婧传》，载《女权运动同盟会直隶支部特刊》（第三期），1923年5月23日。

② 参见：《追悼会的一个缩影》，载《女星》1923年6月5日。

③ 参见颖超：《发刊词》，载《女星》1923年4月25日。

④ 参见：《本刊的第十期》，载《女星》1923年7月25日。

⑤ 参见：《这一月的统计》，载《妇女日报》1924年2月29日。

⑥ 参见：《这一月的统计》，载《妇女日报》1924年3月30日。

与生俱来的。”这种日常化的“弥散于生命之中而常常无处归因的苦”常被视为“命运”，“命的观念让人们接受既有的结果，接受他人成功和自己失败的结果”^[31]。

妇女运动家们并不认可这种宿命论的痛苦归因。她们坚定地指出，妇女所遭受的集体性苦难不是出于个体的“不幸命运”，而是由于罪恶的社会制度，即“有产阶级掠夺”和“旧礼教与男系制度”的多重压迫^①。正是几千年的文化、历史、制度、习惯、法律上，“概不承认女子是一个‘人’，视女子为玩物、为奴隶、未婚时是父母的私有财产，已婚是丈夫的私有玩物，是翁姑的牛马奴隶。”才使她们“陷居于凄惨羁绊的、监狱变形的家庭里，痛苦含酸，隐忍以度非人的生活。”^②她们也清楚地意识到并且反复强调，仅仅依靠个人主义式的奋斗，是远远无法战胜“现有的经济制度与社会组织”所带来的结构性压迫，无法解决妇女普遍的痛苦。只有把妇女问题与劳动问题相结合，在推翻现有社会制度，实现劳动解放即人类总解放之后，才能“完全美满的彻底解决”女子问题^③。

五、“同情”的唤起：读者的情感共鸣与圈层共振

在现代社会中，“痛苦”从个体经验进入公共空间离不开“传播”。媒体对人们如何感受痛苦、如何认知痛苦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妇女的痛苦并非“远方的苦难”（Distant Suffering）^[30]，而是弥漫在日常生活中，无所不在而又习以为常，一般公众尤其是男性很难对妇女的痛苦产生共情。因此，妇女运动家们认为，“明了妇女在现在社会中所处的是什么地位”是解决妇女问题的先决条件，“要使男子对女子的要求有相当的同情”，需要先让他们明了女子所承受的痛苦^④。

无论是悲愤交加的张嗣婧追悼会，还是痛苦揪心的妇女集体性苦难，都经由妇女报刊进行了缜密细致的报道，目的是唤起公众的“同情”。读者“秉一”就是被唤起同情的男性读者。秉一是农学的学生，阅读《女星》上妇女受旧式婚姻戕害的故事之后，开始反思自己的婚姻，并关注身边女性的处境，将家乡一个女孩被迫给已逝未婚夫守贞的悲惨故事写出来寄给《女星》，为女性的不幸遭遇发同情之呼声^⑤。

女星社鼓励妇女向旧家庭寻求作为“人”的解放、投身社会改造事业，与“个人解放”与“再造社会”的时代精神高度契合，在思想进步的男女青年读者中引发强烈的圈层共振。他们写信给《女星》和《妇女日报》，就如何打破封建家庭和婚姻的束缚、互帮互助投身社会改造提出见解，在彼此认同和相互支持中建立起妇女解放的团结网络。

千金小姐周仲铮与旧家庭抗争的故事即为成功动员的案例之一。周仲铮是民国财政总长周学熙的侄女，从小母亲为她穿耳、缠足，父亲以《女四书》、《列女传》训诫女德，聘请家庭教师教授国文和英文，但不允许她去学校读书。周仲铮在偷看《女星》旬刊后，受到了极大的情感刺激，思想开始发生变化。她写信给《女星》，并在女星社的帮助下离家出走，通过报纸向父亲要求读书和婚姻的自由，公开抗争两月有余，终于成功进入女师学习，后来留学法国、德国，取得文学和美术的双博士学位，实现了个人的解放^{[32]（P590-593）}。

远在四川宜宾的年轻女性李一超（即抗日英雄赵一曼，原名李坤泰，1905—1936）也经由报刊

① 参见颖超：《发刊词》，载《女星》1923年4月25日。

② 参见颖超：《姊妹们起哟！》，载《女权运动同盟会直隶支部特刊》1923年5月24日。

③ 参见清扬：《有志开发女子职业的诸姊妹速起》，载《妇女日报》1924年3月2日。

④ 参见：《本报为什么多登琐闻》，载《妇女日报》1924年3月11日。

⑤ 参见秉一：《旧礼教演成的悲剧》，载《女星》1923年7月5日。

获得超越时空的同情与支持。1924年8月11日,《女星》上刊登了李一超的来信《在家长式的哥嫂下生活的李一超女士求援》,控诉封建家庭的守旧与黑暗。李一超的父母去世,在“父死从兄”的封建礼教下,哥哥作为家长控制了家产,以“女校风气不好”等理由,拒绝送她上学,还逼迫立誓终身不嫁的李一超结婚^①。女星社迅速回复了她的求助,并将此信刊登出来征集读者建议。女星社收到了三十余封读者来信,或是提供反抗的方案,或是为她提供金钱和学业的帮助,其中的七篇在《女星》上刊登,给李一超以同情与支持^②。这让李一超感到鼓舞与振奋,更坚定地和封建习俗作斗争,不仅争取到外出求学的机会,还投身国民革命、成长为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英雄。

但是,以妇女报刊为主要载体的情感动员,对动员对象的文化程度、媒介使用和参与能力都有较高的要求,导致其动员效果更多是在知识阶层中。在上海明袜厂女工饶余生看来,《女星》对于“劳动女子的生活状况和痛苦”还应该“多述一些”。作为读书少的女工,她“本想陈述我们的痛苦”而没有能力,希望《女星》能够去工厂调查劳动女子的痛苦。女星社编辑在回信中坦诚对劳动界女子问题很关注,但“没得着材料”,确是办刊的不足^③。此后也派出记者报道上海丝纱厂女工的罢工新闻,并发表多篇文章声援,但编辑和女工读者之间的互动仍然比较匮乏。

六、结论与讨论

作为一种集体性的抗争行动,五四妇女解放运动有其情感逻辑。情感不仅仅是动员妇女的资源或工具,也是妇女运动家们投身抗争的动力。对国家的爱、对丧权辱国的愤慨,以及作为“女国民”平等承担国家与社会责任的自豪感,共同型塑邓颖超、刘清扬、李峙山等天津妇女运动家的主体意识。然而,她们也深深感受到社会对于女性的限制。在五四运动中建立起来的新女性主体被旧婚姻迅速戕害的残酷事实,使她们无比悲愤。通过追悼会这一情感仪式,她们将原本个体性的、非政治性的事件加以重构,发掘出具有普遍性和政治性的内涵,达到“化悲愤为反抗”的情感动员目的;同时,她们有意识地搜集妇女所遭遇的苦难故事,加以琐细密集的媒介展演,并通过对妇女“痛苦”的逻辑归因——不是个体的不幸命运,而是罪恶的社会制度,来动员女性的觉醒与抗争,召唤男性的同情和理解,在读者中唤起强烈的情感共鸣和圈层共振,也建立起妇女解放的团结网络。

本文试图回应近年来关于“诉苦”与革命的情感动员有关的学术讨论。“诉苦”是大革命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展情感工作的重要手段和土地改革最重要的微观动员机制。郭于华、孙立平认为,诉苦重塑普通民众国家观念,“基于诉苦→阶级意识→翻身→国家认同的逻辑过程”,农民的内心世界发生转变和重塑,成为阶级的成员,进而成为新国家的人民。在诉苦运动中,妇女常常因为“所受痛苦最深”、“容易动感情、容易流泪”而被“诉苦”的组织者们重视^[31]。

本文研究表明,在革命政党发动诉苦运动之前,天津的妇女运动家们就将报刊作为妇女“诉苦的机关”,创造性地发展出“媒介诉苦”的情感动员机制,这与同时期侧重思想启蒙、问题探讨等理性化的妇女解放动员方式(如《新青年》)迥异,但与后来的诉苦运动有着相似的情感逻辑。她们以高度性别化的经验讲述,为个体的不幸遭遇赋予公共价值,型塑妇女痛苦的公共性框架,揭橥使妇女遭受压迫的社会结构,唤起妇女的性别意识觉醒,并指向“推翻旧制度、妇女得解放”的行动变革。但是,不同于依托群众集会的面对面“诉苦”,五四妇女解放的“媒介诉苦”借助报刊,

① 参见:《在家长式的哥嫂下生活的李一超女士求援》,载《女星》1924年8月11日。

② 参见:《援助李一超》,载《女星》1924年8月25日。

③ 参见:《一个女工的信》,载《女星》1923年7月25日。

其动员范围集中在有进步倾向的青年知识分子圈层,话语主体依然是妇女中的知识和文化精英,由她们作为妇女“痛苦”的媒介代理人发声。由此,她们也参与建构了旧中国妇女都是“受害的可怜虫”、亟待被拯救这一“压迫—解放”的主流叙事。

我们可以追问的是,随着邓颖超、刘清扬、李峙山等妇女运动家走向与工农相结合,成为共产党和国民党妇女运动的中坚力量,在其后的国民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她们又如何动员更广泛的妇女——尤其是非知识精英阶层的劳动妇女——走出家庭、进入社会、投身妇女解放?是否有更多样化的情感类型被发掘和强化?用以情感动员的媒介和策略又会发生什么变化?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 [1] 罗家伦. 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的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J]. 新潮, 1920(4).
- [2] 许纪霖. 作为社会运动的“五四”[J]. 学术月刊, 2009(5).
- [3] 潘祥辉. 观众成本说:五四运动的一种政治传播学释读框架[J]. 人文杂志, 2015(5).
- [4] 杨念群. “五四”九十周年祭——一个“问题史”的回溯与反思[M].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9.
- [5] 王奇生. 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新青年》为视点[J]. 近代史研究, 2007(1).
- [6] 李大钊. 战后之妇人问题[J]. 新青年, 1919(2).
- [7] 杨国斌. 悲情与戏谑:网络事件中的情感动员[J]. 传播与社会学刊, 2009(9).
- [8] Reddy, W. M. *The Navigation of Feeling: A Framework for the History of Emotion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9] 李志毓. 情感史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史研究[J]. 史学月刊, 2018(4).
- [10] 白淑英, 肖本立. 新浪微博中网民的情感动员[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5).
- [11] 裴宜理. 重访中国革命:以情感的模式[J]. 中国学术, 2001(4).
- [12] 李里峰. 土改中的诉苦:一种民众动员技术的微观分析[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 2007(5).
- [13] 李志毓. 沙基惨案:一场革命的“情感动员”[J]. 粤海风, 2010(4).
- [14] Taylor, V. , Watching for vibes: Bring emotions into the study of feminist organization[A]. Ferree, M. M. , & P. Y. Martin. *Feminist Organizations: Harvest of the New Women's Movement* [M].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 [15] Hercus, C. Identity, emotion, and feminist collective action[J]. *Gender & Society*, 1999(1).
- [16] Melucci, A. , Getting involved: Identity and mobilization in social movements[A]. in Kriesi, H. & B. Klandermans, & S. Tarrow. *From Structure to Action: Comparing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across Cultures* [C]. JAI, London, 1989.
- [17] 杭苏红. “观念解放”还是“情感解放”? ——民初湖南新女性“离家”的实践困境[J]. 妇女研究论丛, 2016(1).
- [18] 李净昉. 妇女运动领袖的媒体言说与社会行动——以天津《妇女日报》为例[J].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4).
- [19] 邓颖超. “五四”运动的回忆[A]. 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天津市妇女联合会编. 邓颖超与天津早期妇女运动[C]. 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 1987.
- [20] 邓颖超. 工读的失败[J]. 妇女杂志, 1924(6).
- [21] 峙山. 生活难的苦闷[J]. 妇女杂志, 1924(6).
- [22] 颖超. 两个使我难忘的五七——并告女师范的师生[A]. 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天津市妇女联合会编. 邓颖超与天津早期妇女运动[C]. 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 1987.
- [23] 女星社募捐启[A]. 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天津市妇女联合会编, 天津女星社[C]. 北京:中国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5.

- [24]刘利群. 社会性别视野下的女性媒介研究[A]. 荒林主编. 中国女性主义(12)[C].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 [25][美]兰德尔·柯林斯. 互动仪式链[M]. 林聚任,王鹏,宋丽君,译. 上海:商务印书馆,2009.
- [26]海青. 伤逝:对民国初年新女性形象的一种解读[A]. 杨念群主编. 新史学(第一卷)——感觉·图像·叙事[C]. 北京:中华书局,2007.
- [27]追悼歌[A]. 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天津市妇女联合会编. 邓颖超与天津早期妇女运动[C]. 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87.
- [28]袁光锋. 公共舆论中的“情感”政治:一个分析框架[J]. 南京社会科学,2018(2).
- [29]殷子纯. 天津女星社及其主要活动[A]. 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天津市妇女联合会编. 邓颖超与天津早期妇女运动[C]. 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87.
- [30]袁光锋. 感受他人的“痛苦”：“底层”痛苦、公共表达与“同情”的政治[J]. 传播与社会学刊,2017(40).
- [31]郭于华,孙立平. 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J]. 中国学术,2002(4).
- [32]周仲铮. 我与女权运动同盟会直隶支部及女星社的来往[A]. 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天津市妇女联合会. 邓颖超与天津早期妇女运动[C]. 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87.

Grief, Indignation and Painfulness: Emotional Mobilization in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during the May 4th Movement

— Taking Tianjin as the Center

FENG Jian-xia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of history of emotions, this paper takes Deng Yingchao, Liu Qingyang, Li Qishan and other feminists in Tianjin during the May Fourth period to examine how they use the media to launch emotional mobilization to arouse women's consciousness and public sympathy, and explores the emotional logic of the Chines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In the May Fourth Patriotic Student Movement, the love of the country, the anger against the humiliation of the country, and the pride of the national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as a "female citizen" jointly shape the subjective structure of Deng Yingchao and other women's liberation pioneers. The strong "Grief", "Indignation" and "Painfulness" caused by the widespread suffering of women is not only the emotional driving force for their participation in women's liberation, but also the most common emotional resources they use to mobilize women through emotional ritual and media performance. There is a strong emotional resonance among young male and female readers.

Key words: women's liberation; emotional mobilization; emotional ritual; media performance

(责任编辑 周振新)